

目 录

少奇同志在淮南抗日根据地

 开创前后作的几次指示周骏鸣(1)

回忆兆麟金伯文(8)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喻 杰(32)

延安南区合作社简史.....多田正子(51)

塞上风云

 ——回忆邓宝珊部十一旅起义始末贺晋年(68)

帮助卫立煌部脱险.....周长胜(85)

蒋家狱中四百天见闻.....季焕麟(89)

八路军山东纵队组建前后.....王 彬(124)

回忆第六十七军参加会攻太原.....韩 伟(142)

三一八惨案和中共北方区委冉廷栋(151)

回忆李汉俊老师.....夏之栩(176)

湖北省委讨论过李汉俊恢复党籍的问题

.....袁溥之(183)

怀念拔哥	黄美伦(186)
韦拔群同志被害经过	陈欣德(194)

人 物

几番蹉跎志愈坚

——回忆许权中烈士生平	李 果(198)
-------------------	----------

阿金在舟山

——金维映同志早期革命斗争事略

.....	车鸿云(215)
-------	----------

少奇同志在淮南抗日根据地 开创前后作的几次指示

周 骏 鸣

刘少奇同志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到达安徽省定远县大桥镇的。他当时是中原局书记，化名胡服。大桥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当时以原新四军四支队老八团为基础改编的五支队刚成立不久。江北指挥部主要是指挥新四军四支队和五支队。五支队司令员是罗炳辉同志，我任副司令员。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少奇同志。

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到一九四〇年七月中旬，少奇同志在淮南地区前后七个多月，作过许多指示，对我们认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王明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项英的精兵主义思想（项英说“兵在精不在多，兵多了没有饭吃，会破坏统一战线”）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部队的发展和淮南根据地的开创，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年代虽然久远了，但有几点在我心中仍留着深刻的印象。

抗战要有枪杆子 抗战还要有个家

一九三八年三月间，新四军四支队（包括从桐柏山游击队改



一九四二年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左起：张树才、刘顺元、方毅、张爱萍、张云逸、
陈毅、宋文（蹲者）、罗炳辉、杨梅生、龙潜、周骏鸣。

编的第八团)从大别山区进到了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五县之间的抗日前线。当时南京已经失守，国民党向江北溃退时，沿途丢弃的大批枪支散落在民间，江北沿江各县的国民党党政负责人大多在敌人到来之前就逃跑了。土豪劣绅和土匪帮会势力趁机实行封建割据，设卡收税，大发国难财，搞得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抗日高潮，许多青壮年来到部队驻处，要求参军。但当时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和项英的精兵主义，把大批要求抗日保家救国的人们关在大门之外，部队没有得到应有的扩大。大别山是鄂豫皖老革命根据地，可是我们原来驻在大别山的新四军四支队开走了，没有建立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不发给我们抗经费，只好靠募捐，打汉奸、打“资敌”（“资敌”指到敌占区做生意，在经济上资助敌人的人）过日子。部队连每天每人五分钱菜金也不能保证。正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候，少奇同志来了。他问指挥部领导同志：“抗战怎么不知道要枪杆子呀？抗战还要一个家嘛！给人家做苦力（指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扩军、巩固政权），出力不讨好，最后把你们赶出来，打你们几个耳光，再踢上你们几脚，还骂你们几个‘丢那妈’（广东骂人语），有的甚至被抓起来坐牢或处死。”这段话非常中肯。少奇同志很快召集了干部大会，传达党中央六中全会的指示，要我们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迅猛扩大抗日力量，不要因怕破坏统一战线而不敢发展，不能被统一战线捆住自己的手脚。我们听了传达之后，好象拨开了云雾，有了明确的方向。仅三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就由四千多人发展到近万人。顽固派看到这种情况，就红了眼，但也不敢公开打出反共的大旗，于是不宣而战的摩擦就开始了。

不要怕摩擦 要坚决反摩擦

一九三九年底，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龟缩在大别山的桂顽李品仙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密谋对我东西夹击。当时我同另一个同志到了江北指挥部。一天，少奇同志把我们找去说：“赶快回去，准备反摩擦。”怕我们不能很好理解中央的意图，他又补充说：“不要怕摩擦，而要反摩擦。要在摩擦中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要在反摩擦中建立自己的家。顽固派一定要摩，那就以摩反摩；非摩不可，坚决地摩，不摩就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他的话非常坚决而有信心。我们立即骑上骡子赶回路东。回到路东不久，果然路西的摩擦战就开始了。桂顽大举向我路西部队进攻，我们在路东的主力 and 苏皖支队均调到路西。韩德勤乘我主力调到路西之机，以超过我十倍的兵力向我五支队司令部附近半塔集教导大队进攻。因师出无名，士兵也不愿打新四军，他的部队进到半塔集东门外一个乱坟地里，就卧倒向半塔集开枪，乱放一通。这实际上等于向我教导大队通消息。当时教导大队正在西山上出操，听到枪声，才从操场上飞跑回来。半塔集被韩德勤的部队包围了三面，如果他们在山上用火力掩护，一个冲锋即可冲进半塔集。但占山之后，士兵都趴下不动了，顽固派军官用棍子打，士兵就是不动，结果围了七八天，也没有进入半塔集。路西战斗结束后，张云逸副军长和罗炳辉司令员回师路东。苏北挺进纵队叶飞副司令员率领四个营增援半塔集，这时顽固派官兵都象穿了“兔子鞋”，一天一夜就跑过了三河以北。这样，我们很快建立了天长、盱眙、来安、嘉山、六合、高邮、仪征、甘

泉八个不完整县的政权。路西发展也很快。路东路西都建立了联防司令部。少奇同志说的话实现了：“抗战还要有个家嘛！这个家叫淮南抗日根据地。”

今天向你们讲老实话

反摩擦战斗胜利了，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了，我们进行抗战有了自己的家，少奇同志当然很高兴，整个淮南根据地的军民都很高兴。有一天，少奇同志说：“今天可以向你们讲老实话了。当我初来到大桥时，感觉很不好办，你们的兵少，只有四五百人。我有什么办法？有了扩大部队最好的时机，你们没有扩大部队，最好的抗日根据地——大别山老苏区这个家，你们让给人家了。”听了这番话，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党中央三令五申指示项英，要他把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开到江北来。可是项英一直不听，而执行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以至在皖南事变中，九千多人被国民党军队消灭了。如果项英遵照中央指示，率部队开到江北，把军部安在群众基础最好的大别山老根据地的中心，就可避免这个惨重的损失。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南京之后，经合肥和舒城、桐城公路向武汉进攻时，沿途国民党军队和县政府都跑了，地方处于无政府状态，混乱不堪，正是我们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最好机会。如果当时不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束缚，在平汉铁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东至海边，这个广大而富饶的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扩大二十几万到三十多万抗日军队是完全可能的。这样一来，华东的抗日局面就大不相同了。这个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一下。

不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要多做伪军工作

反摩擦战斗胜利后，我们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因为有了家，抗日的积极性更高了，经常袭击鬼子和伪军据点，破坏津浦铁路。我们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少奇同志说：“不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鬼子要安据点，不让它安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力量还达不到，要多做伪军工作。”如果不是少奇同志这个正确指示，我们经常搞袭击，威胁南京的安全，妨碍津浦路通车，就会逼着敌人在铁路两侧挖封锁沟，打封锁墙，甚至加铁丝网，增设据点。那就会使路西路东两个根据地隔离开来。路东根据地三面靠水，不能徒涉，西面靠津浦铁路，这种天然地形很容易被封锁。那就真象少奇同志所说的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了。可以肯定地说，二师的师部及以后新四军的军部，就不可能在黄花塘一个小村庄上，盖上平房住到抗战胜利；大柳郢盖的医院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使很多伤病员得到治愈，使很多医务干部得到培训。这样的抗日根据地在全国是不多的。这是执行了少奇同志“不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要多做伪军工作”指示的结果。

变分兵把口为集中力量歼灭敌人

根据地刚刚建立时，地方武装尚未健全起来，顽固派对我根据地采取蚕食政策。他们分散成很多小股，袭击和侵占我尚未巩

固的根据地，使我防不胜防。当时我们采取分兵把口的办法保卫根据地，结果每天挨打造成伤亡。根据地不断缩小。少奇同志指示说：“要把分兵把口变为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不要怕根据地丧失，没有失就没有得。中国有句老话，叫‘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要集中力量一个一个歼灭敌人，变被动为主动。”结果很快把顽固派蚕食阴谋粉碎了，巩固了根据地，扩大了部队。

我对少奇同志的认识

少奇同志在抗战时期出去工作没有带多少人马，经常是带一个秘书，两个警卫员，一匹马，穿一身灰布衣服，戴一顶八角帽，同普通战士一样，谁也看不出来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由延安党中央到华北，由华北到华中，由华中到华东，由华东到山东，由山东回延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辛勤工作，功绩是卓著的，是不能忘记的。少奇同志从不要什么“秀才”班子，也不带多少人马保卫他，看起来他不太忙，经常可以看到他读艾思奇同志的哲学著作，或同干部谈话。可他走到一个地方就能把这个地方的工作搞好。

少奇同志善于深入浅出，根据每个人的水平来解决问题。他常说：“讲话是给人家听的，写文章是给人家看的，首先要使人能听得懂，看得懂。如果人家听不懂，看不懂，是个极大的浪费。可能是他自己还没有真正搞懂。”

回忆兆麟

金伯文

东北抗日联军著名领导人之一李兆麟将军被敌人杀害已经三十七年了。兆麟，他既是我的领导、战友，又是我的兄长和丈夫，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岁月，这篇文章就算一件菲薄的祭品吧。



李兆麟同志遗像(画像)

我一九一八年出生在吉林省汪清县哈蟆塘大房子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里。父亲金善极因参加朝鲜独立军，反对日本统治，一九二一年被日本鬼子砍了头。哥哥金银植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是早期汪清县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被敌人枪杀。在父兄的影响下，我十三岁就开始了革命活动。九·一八

事变后，我离开家到游击区从事儿童团工作，一九三五年五月入伍参加了抗联二军。不久又转到五军，随部分同志到牡丹江边深山密林中的后方被服厂工作。一九三七年初，组织上决定调我到铁骊后方建立新的被服厂。这次调动后不久，我第一次见到了兆麟。

二月的东北，冰天雪地，我随交通员刘升同志在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里踏着齐腰的深雪跋涉。冬季在深山里赶路要算天刚亮的这一刻最难熬，西北风一刮，狗皮帽子上满都是霜，两边脸蛋儿上冻起了鸡蛋大的两个大泡，难怪当地老百姓说这是“鬼毗牙”的时候。就这样，我们走了近一个月，才到达目的地。

到了目的地后，才知道远征部队没有打下铁骊。当时大部队已经撤走，不少伤员还留在铁骊附近的深山里。组织上决定让我和于桂珍到离伤员一、二里远的一个原来给胡子队种大烟的老大爷的小房子里住。这位老大爷有六十多岁，病得很重，第二天中午就咽了气。部队又派一个老同志带着枪来小屋和我们作伴。说是给我们壮胆的，可这个老同志说小屋里闹鬼，夜里时不时地跑出去放枪壮胆。我虽说参加部队多年，打鬼子没有害怕过，可是说起鬼来，我还是真有点怕。正在此时，兆麟到了我们这里。这时他是反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赵尚志同志任总指挥），用名张寿篈。

兆麟先和伤员住在一块，没多久就到我们小屋这儿来了。他穿着战士的棉军衣，背上背着背兜。当时兆麟只有二十七岁，但长年在深山老林里风吹雨淋，满脸的连毛胡须，猛地一看特显老成，说他有三、四十岁，也会有人相信。只是他两道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给人以威严而又刚毅的感觉。他到我们这里是

为赶写一份材料，所以话不多。只见他时而埋头写着，时而又倒背着手来回踱步思考，大概是写顺手了，有时还哼上几句京剧。我那时汉语说不好，平时很少同他搭讪，只是默默地观察这个看去颇为严肃的指挥员。

于桂珍原来就认识兆麟，见面后，兆麟问她我是哪里来的，于桂珍便一一向他作了介绍。这时，兆麟对我说，三军也有不少朝鲜族同志。当他听说这里前几天死过人，还闹了鬼，我们都害怕时，顿时没了那股严肃劲儿，大笑起来。他说他小的时候也怕鬼，有一次路过一片坟地，天下着雨，黑得不行，坟地里一亮一亮的，真瘆得慌。只觉得背后鬼在追他，吓出一身冷汗，头都不敢回，拼命往前跑。后来想想谁都怕鬼，不知到底有没有鬼。于是他壮壮胆，猛地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他说其实世间根本没有鬼，都是自己吓唬自己。他讲起故事来有声有色，特别生动引人，我们听后都笑了。我虽说参加革命多年，生活再艰苦，也从未退缩过，为的是要报仇。“无神论”还是头一次听说。这时，我才第一次感觉到，革命者除了要不怕死，还应该懂得许多革命道理。兆麟却懂很多革命道理，我在他面前显得多么单纯和无知啊！

几天后，通讯员来报告说敌人要进山讨伐了。当时我们的粮食不多，兆麟立即赶到伤员的住处，当机立断先把自己骑的唯一的一匹战马杀掉，给伤员每人分了几块马肉，其余的人只分到很少一点点口粮。他让伤员连同护送的战士先向伊春方向转移。为了伤员的安全，兆麟把我和于桂珍留下来和他一块观察敌人动静，第二天才离开这里。为了挽救这二十几个伤员，我们应尽快地找到部队，好让他们带着粮食来接应伤员。兆麟带着我们俩日

夜兼程，在深山雪地里急行军。

这时正值一九三七年春节后，雪下得很大，有的地方直没过了腰，走起来是很艰难的。随大部队行军，还可以由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战士轮流在队伍前面踏雪开道，其他人能跟在后面走。而这次只有三个人急行军，深山里道路又不平，就更为艰难了。兆麟用随身带着的罗盘辨别方向，在前面踏雪开道，还不时扶着我们越过难攀的山路。白天不能点火，怕烟引来敌人，我们就一口炒面一口雪充饥。晚上就在雪地里宿营，先用盆子把雪推到一旁，清理出一小块地方，然后用锯放树，再把树锯成段搭起来，再用干树枝点火。不多时火就熊熊地烧了起来。这时我使用盆子化雪做点稀米汤充饥。后几天粮食没了，只能化盐水充饥了。吃了饭，又用盆子化雪水洗脚，然后用针穿上线挑脚上的泡。再用火烘干鞋、包脚布和鞋里絮的乌拉草。遇上鞋坏了还要用帆布缝个套子当鞋用。最后就着火光相互把白天刮破的衣服缝好。于桂珍刚参军不久，能走下一天急行军来，就很不容易了。我尽量照顾她，多承担这些琐碎工作。夜深了，我们在火堆旁铺好的干树枝上合衣躺下，用背兜当枕头，一天的紧张和疲劳，使我们感觉不到凛冽的西北风和鹅毛大雪，一躺下就睡着了，醒来时常常是胸前挺暖和，背后却结了冰霜。兆麟一路上象兄长似的照顾着我们，把自己唯一的一条军毯给小于盖上。夜间睡觉时要轮流值班，他也总是让我们多睡一会儿。没多久，我们就赶上了伤员的队伍。在冰天雪地里爬山越岭，好人都受不了，何况是些流血负伤、口粮不足、体质极差的战士。兆麟一面鼓励伤员同志：“坚持到底，部队很快就会来接我们的！”一面对我们说：“不能看着伤员继续流血牺牲。他们能在敌人的枪口下幸存下来，决不能

让他们死在转移的路上。”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兆麟决定将于桂珍留下和伤员同志们一块行动，独自带着我又继续上路了。想起这二十几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伤员，我们心如火燎，加快了行军的速度。几天后，我们到了伊春军官学校。兆麟马上派部队火速带上粮食去接应伤员，不久伤员都陆续到了伊春军官学校。兆麟安顿好伤员，带着我和于桂珍又上路了。

一天，兆麟突然发现前面不远的密林深处有烟火，他立即警觉地拔出手枪，果断地命令我和小于就地在两棵大树后藏好，自己独身一人向前。他告诉我们假若听到枪声，就立即返回一里以外的深山密林里隐藏，并约定敲打树干几下为联络信号；假若看到他招手，我们就立即跟上去。说完他拿着枪朝前走去，我们俩全神贯注地看着兆麟的背影，只见他渐渐地消失在密林深处。过了一会儿，见到他在远处向我们招手。我俩松了一口气，急速地顺着他的脚印追了上去。原来这里有一间小屋子，住着一位长年不出深山、以种地打猎为生的老乡。当地都称呼这种人为“把头”。我们在这个把头的小屋里借住了一夜。这一夜兆麟还向他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第二天一早，我们告别了这个把头继续上路了。

我们又走了近一个月，才返回汤莉川三军留守处。第二天，兆麟派人送我们回三军被服厂。临行前，兆麟对我说：“天已暖了，我要到松花江以南去活动，毯子送给你吧。”我们和兆麟分手了。

回到三军被服厂，我仍当负责人。据当时被服厂留下的王正平、于颜秀、于秀珍等同志说，我走后（指到铁骊去），鬼子讨伐队到了这里，破坏了被服厂，杀死了这里的一个小把头，另一个

年纪稍大些的姓严的老把头跟省委走了。

不久，组织上决定将被服厂搬到帽儿山。帽儿山的山势陡峭，可是山顶却很平，山上有泉水，自然环境可真美，有如神话中描写的仙境一般。这里原来也住着一个四十多岁的把头，山上有一间小房子，周围还种了点地。我们当时就住进了那间小房子。北满省委就设在我们山下面的河边上。前面说的那个严把头这时在山下省委干些杂务。

这年的七月份，张兰生、赵尚志、冯仲云和兆麟同志来这里开会。记得于保合同志也来了，还有二、三十人的警卫部队。被服厂的几个女同志为他们洗衣、做饭、缝补衣裳，没多久就跟他们混熟了。休息时，冯仲云、赵尚志等同志总是拿我和兆麟开玩笑，兆麟若无其事，倒背着手，来回踱步，一言不发。我只当玩笑话听，但我心里挺纳闷的，兆麟为什么不制止他们呢？

一天下午，兆麟把我喊了去，他直来直去地开口就说：“同志们这几天总是开我们的玩笑，你怎么想的？”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兆麟是省委和抗联的领导同志，而我只不过是一个不识几个汉字的年轻战士，这怎么可能呢？我从来没往这上头想过，于是照直说：“我没想过。”兆麟诚恳地说：“要是我真爱你？你……”没说完，他就停下话头，期待地看着我。我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心慌极了，只说了一句：“让我想想。”就跑了出去。

自从省委领导同志到这里开会后，小屋的炕就让给他们睡，我们几个女同志在小屋里打地铺睡。这天夜里，我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想着和兆麟头一次见面的前前后后。说实在的，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敬重他。对我来说，他是领导，又是

兄长和朋友，而且他爱我，我还要求什么呢？我觉出来了，兆麟在炕上也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我就答应他了。这以后，我们常在一起聊聊，对兆麟了解得越多，我越觉得他是很值得爱的。

省委会议在这里开了半个多月。会议结束前，省委研究同意我们结婚。一天中午，我照顾同志们吃午饭，有人提议，当天下午给我们举行婚礼。大伙儿采来了许多五颜六色的野花，把房子前面的空地简单地布置了一下。当时省委有一台留声机，放起了歌曲。冯仲云同志为我们主持婚礼。冯仲云和赵尚志同志平时就没有领导的样子，爱开个玩笑，这下可得到了机会，加上一帮警卫战士在一旁起哄，直闹到天黑。就这样，我和兆麟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在战友们的欢乐声中结婚了。因为没有条件，我们虽说结了婚，仍是他和省委领导睡炕上，我和女同志睡地下。后来有一天大家好象恍然大悟，想起来我们已经结了婚，也应该有个“新房”了，于是天当房，地当床，同志们在小屋附近支了一个小帐篷，还特殊优待，让给我们一条军毯。可这天半夜起了狂风暴雨，刮跑了帐篷，把我俩淋得透湿。我们跑回小屋叫门时，冯仲云和赵尚志同志还捉弄我们，说什么也不叫开门，让我们在外面整整浇了半夜。这就是我们新婚第一夜，真是永生难忘。几天后，兆麟他们就离开这里走了。

兆麟离去后没几天，交通员捎回了一个条子，上面写着：

“贞顺同志(我原来的名字)：我已过了松花江，一切都好，你近来很闷吧！被服厂的工作不多，要抓紧时间学习文化。”

这是一张极薄的小纸，兆麟的一笔字又工整又秀气，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因为搞不到布，被服厂的工作停了。组织上决定我们下山和当时留在省委的冯仲云、张兰生等同志并到一块。我们

就利用这大好的时机学开了文化。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汉语。没有纸、笔，我就用一个小树枝在地上写，碰到不会写的，就去问同志们。这段学习为我学习汉族文化打下了基础。

又过了些时，兆麟和黄成植同志来到我们这里。这时组织上已经决定让他去六军当政委，调我去六军帽儿山被服厂工作。他到这儿的第二天，我便随他们出发了，约有半天的时间就到了六军被服厂。第三天，兆麟就和黄成植同志走了。

当时六军的被服厂的厂长是裴成春同志，除她之外还有李敏、李桂兰、小穆，六军军长夏云杰的爱人和女儿，还有一个裁衣工人张世臣同志(绰号张瞎子)。李再德同志当时也在这里，但我去后不久就调走了。为了被服厂的安全，在离我们住处一里以外的地方，驻了一个排的部队，记得排长姓张，指导员姓金。我们在这里紧张地赶制冬装，大批冬装做完时就到了一九三八年初了。

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夕的一天，交通员送信来，说敌人要进山讨伐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即把缝纫机、剩余的布匹和棉花就地藏了起来。三月中旬的一天，天刚亮，敌人的讨伐队果然由西南方向的山上下来了。当山上的岗哨发现后鸣枪往山下跑时，敌人的机枪就响起来。我们陆续冲出房子。不幸，李桂兰、夏军长的爱人、女儿和张世臣同志被敌人抓住了，他们把张世臣同志捆在房前的大树上，点上了火，连同被服厂一块烧了后就撤走了。等到天全黑下来，我们派了几个同志下山掩埋了张世臣同志后，就向汤原方向开拔了。

我们在汤原地区深山里活动时，与兆麟带的教导队会合了。刚参军的陈雷同志也到了这里，他一身学生打扮，白净净的显得挺斯文，引起了同志们的注目。我们大约在汤原地区活动了近两